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金銀玻璃琺琅器全集

1 金銀器 (一)



中國金銀玻璃琺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金銀玻璃琺琅器全集

1

金銀器（一）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國金銀玻璃琺琅器全集·第1卷 / 楊伯達主編·
石家莊: 河北美術出版社, 2004.12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ISBN 7-5310-1725-3

I . 中... II . 楊... III . ①金銀器 (考古) - 中國 - 圖集 ②玻璃器皿 - 中國 - 古代 - 圖集 ③琺琅 - 中國 - 古代 - 圖集 IV . K876.0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15796 號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領導工作委員會

總顧問 鄧力群

主任 王忍之

副主任 龔心瀚 于友先 劉忠德

房維中 劉積斌

常務副主任 許力以

委員 啓功 廖井丹 高明光

張文彬 謝辰生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總編輯出版委員會

總編輯 啓功

常務副總編輯 趙敏

副總編輯 郜宗遠 張圀生 程大利 劉建平

委員 (按姓氏筆畫爲序)

于永湛 王朝聞 王樹村 王琦 艾中信 朱家縉 朱誠如 朱述新 沈鵬 李學勤
李書敏 李朝成 李新 吳成槐 吳尚之 吳鵬 金維諾 林文碧 段文傑 俞偉超
郜宗遠 馬承源 奚天鷹 啓功 寇曉偉 張仃 張圀生 張晨光 張小影 常沙娜
許力以 鄔書林 程大利 楊伯達 楊牧之 楊新 楊純如 趙敏 鄧白 樓慶西
劉建平 劉慈慰 樊錦詩 閻曉宏 蘇士澍 羅哲文

一九八六年至二〇〇〇年期間曾任《中國美術分類全集》領導工作委員會、總編輯委員會的
副主任、總編輯、副總編輯委員名單如下：

領導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吳作人 劉杲

委員 袁亮 張德勤 邵宇

總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邵宇

副總編輯 陳允鶴 楊瑾 龔繼先 劉玉山 吳士餘

委員 古元 王伯揚 宋鎮鈴 林瑛珊 周誼 姚鳳林 陳宏仁 孫振庭

清白音 趙志光 趙貴德 劉振清 謝稚柳 關山月

前言

中華民族的文化，從時間久遠來講，已有五千多年歷史，這是中外人士都知道的；從覆蓋的面積來講，可有若干萬平方公里的區域，也是中外人士都已看到的；若從它的構成因素來講，恐怕瞭解的人士就比較不太多了。

無論研究中華文化史或欣賞由此文化所構成的美術品的人，沒有不驚嘆它的燦爛、豐富而有應接不暇之感的。如果探討其原因所在，就會理解到絕不可能僅僅是某一時代、某一地區、某一民族所能獨自創造完成的。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族之間自古即隨時隨處，互相習染、互相融合，纔有現在所見的驚人燦爛的文化及其成果。

世界歷史上有不少幾千年前已建立的文明古國，但至今已不存在或雖仍存在却曾中斷過一段時間的并不少見。而我們中國則綿延數千年歷史未曾中斷，甚至某個事件的日期，古史書上的記載可以和出土文物銘刻相吻合。中國的歷史長河中，雖也曾有些小段為某些兄弟民族掌了政權，但他們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組成部分，沒有割斷中華文化傳統，所以說中華文化是五千多年綿延未斷的文化，可稱當之無愧的。

幾年前，中央宣傳部組織了眾多的文化、文物工作的專家，編成了《中國美術全集》六十大冊。出版以來，讀者眼界大開，這六十冊書起到了現有的任何博物館及任何文化藝術史的論著都無法取得對人民的啓發、教育作用。事實很簡單，無論哪個博物館，哪部研究、介紹這類學術的著作，都不可能同時擁有這些陳列品和實物的直觀插圖。凡有過閱讀、研究這類書籍的人都

知道，讀千百字的文字說明，不如看一眼實物，那麼能一次瀏覽這些圖片，豈不『勝讀十年書』！

現在我國文化、教育事業隨着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地擴充、提高。文史書籍的搜集、重印，以及從種種角度加以整理傳播，已取得普及與提高的極大效果，而美術方面也不容無所擴展，充實。由於原六十冊的內容難以盡納各個時代的代表作品，而且新發現的文物珍品也有待補充。更有些近、現代的優秀作品，反映中國文化藝術新發展的，過去還未選編，現在亦應納入。於是領導上再次組織群力，在以前六十大冊的基礎上翻成幾倍，編為《中國美術分類全集》，預計約有三百餘冊。這部新編巨著中，藝術品種類雖然變動不大，但在每一種類中并非祇數量加多，重要在盡力增加具有代表性的名品。

本書所收各類藝術名品，以國內、境內公、私所藏為主，國外、境外藏品中最重要的名品具有代表性的，也酌量收入。至於近期最新發現及最近出土的，由於編輯印刷工序關係未及補充，俱有待於續編工作。

這部巨著成書，我們雖然足以自慰，但從中華文化中美術類的全部來說，還有很大的距離，希望本書的讀者，尤其是在世界的廣大專家，能把它看成是中華文化中美術部分的扼要介紹，纔較符合實際。現在我們全體工作人員共同敬願廣大讀者予以指正！

啓功



一九九七年四月

主編

楊伯達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凡例

- 一 《中國金銀玻璃琺琅器全集》係《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之組成部分。該全集分爲金銀器三卷、玻璃器一卷、琺琅器二卷共六冊。
- 二 選錄之器物均爲各時代精品。除器物本身的藝術價值外，兼顧其歷史藝術及考古價值。
- 三 本集內容分三個部分：一爲專論，二爲彩色圖版，三爲彩色圖版說明。
- 四 爲方便國內外學術界讀者，中文版全部用繁體字排印。

富麗華貴的中國古代金銀器

楊伯達

夏、商——清（公元前一八〇〇年——公元一九一一年）

金銀器是指以黃金或白銀為原料經加工而成的典章文物或飾件與器皿。我國的黃金礦藏分布較為廣泛，共有幾百處，主要的產金省份有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安徽、湖南、湖北、貴州、雲南及新疆等地，但產量却很少。黃金依其產狀分為山金和天然金，因其形狀又有橄欖金、子金、膀子金、狗頭金、馬蹄金、沙金、麩子金等名目。山金礦純度不足，須經冶煉成純金之後方可利用，所以古代尤其遠古時期人們僅用塊金、麩金等天然生成的黃金作原料製作金器。

黃金呈黃色，永不變色，光芒四射，魅力誘人，十分珍貴。其物理性能特別優越，如不怕侵蝕，不受風化，延展性強，硬度二點五——三點〇，便於加工。

白銀產量較大，它的物理性能接近黃金，但易氧化，表面變成深灰色或黑色，影響其美觀，令人生厭，所以在材料審美及單位價格上遠不及黃金。其加工工藝與黃金加工工藝相同。

金銀器加工工藝與青銅器、鐵器、錫器等加工工藝有着很大的差異，是一門獨立的或者說特殊的手工藝部門，大體包括錘鑿（將金塊錘打成薄片狀）、拔絲（將金塊拔成粗細不等的絲）、炸珠（將金塊製成魚籽大小的金珠）、掐絲（將薄片切成窄而扁的細絲，掐成圖案）、焊活（用焊藥塗在胎或絲片上，經火熔焊牢固）、打造（將金片錘打成形或錘出隱起圖案花紋）、鑿鈹（鑿是指鑿刻圖案細部，鈹是指陰刻細綫，亦稱『平鈹』）、熔鑄（即以金銀熔液注入範中，冷卻後啓範取出金件）、纒絲（將金絲製成花紋焊接而成）、編織（以金絲編織圖案或器物）、鑲嵌（包括在掐絲之間或鑄造時預留下的凹槽中嵌入寶石或用包鑲、爪鑲等工藝方法鑲嵌寶石）等工藝。上述金工藝中鑲金珠、掐絲、纒絲、鑲嵌等工藝用於製做首飾或飾物，極其精巧細緻，故稱『金細工』而有別於一般的金銀工藝。所以，金細工是金銀工藝中的精細工藝，而在銅鐵工藝中沒有這種技術，僅在金銀工藝中所獨具，是一種特殊手工藝，在金屬工藝行業中占有特殊地位，因而我們在研究古代金銀器工藝時要特別關注黃金成器及裝飾工藝的具體工種及其特點，區分是金細工藝還是一般金工藝，二者有精粗之別、優劣之分，不能不加區別地籠統而論。

在研究中國古代金銀器的工作中有一個不同於研究玉器、青銅器的問題，這就是要將眼界擴展到我國西鄰地區金銀器的發展歷史，而不可僅僅局限於我國二十世紀下半葉所出土的金銀器這個狹小的範圍中，不僅要關注中西金銀器及其工藝上的交流影響，還要看到產自外國金銀器輸入我國及其流傳的史實。這要求我們要客觀地、公正地對待西方金銀器對我國金銀器的影響。當然，如何把握其分寸，不偏不倚，也

是十分困難的，當前重要的工作就是將外國金銀器從出土金銀器中剝離出來，公諸於世。為此，特將出土的外國金銀器擇其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一并刊出，以便對比，做出較為科學的判斷。

古代金銀器一直為上層社會所壟斷，低級官吏和庶民是無權使用的，祇能望而興嘆。出土金銀器大多用於朝廷寶璽、王侯高官的印章及禮制禮儀器物、飾物，有的則成為高貴富有者的資財。同時，金銀器又可作為間接的交換媒介，在手頭緊迫時可將其抵押於質鋪，換成貨幣，或將其銷熔鑄成寶錠，充作直接的交換媒介或賦稅手段，所以出土金銀器當中也包括不少的金銀泉貨，考慮到貨幣是一門獨立專業，故本集原則上不包括古代金銀貨幣。

上編 多民族金銀器的共存及其盛衰

夏、商——南北朝（公元前一八〇〇年——公元五八九年）

這長達二千三百餘年的金銀手工藝經歷了萌生、成長及初步發展的過程。根據二十世紀上半葉出土金銀器可以肯定地說，我國金銀器的起點在青銅器時代，大約是在距今三八〇〇年的卡約文化時代和殷代。從其地緣及其風格特點來看，大致可以分為北方草原金器板塊和中原黃土帶金器板塊這兩大金銀器文化板塊。另外，西南方紅土帶金銀器有着暫短的相對獨立的發育過程，最終融溶於中原金銀文化而消逝。這兩大黃金白銀文化板塊既各自成長，同時并存又互為滲透，相互影響，取長補短，加以完善。從一些迹象來看，我國原始金銀工藝應是獨立成長的有着鮮明的土著性和本土性的後起的傳統工藝。譬如，我國迄今所見最早的金銀器出於甘肅卡約文化和殷代，均以金葉片和金絲為其原料，經切割、平鍛、錘打、盤絲、焊接等工藝而成型。到了西周，接受青銅工藝的影響出現範鑄、鑿刻的金器。以掐絲、焊珠、鑲嵌為基本技術的金細工大約出現於戰國晚期，成熟於東漢。西方輸入我國中原的金銀器迄今所見最早的也不早於羅馬帝國和古波斯帝國，大致在公元前四世紀—公元前三世紀。由此可知，中西金銀器工藝的交流要按照史料記載和出土金銀器實事求是地加以研究方可做出令人信服、合乎史實的判斷。

一、北方草原地帶金銀器

青銅時代——西突厥（公元前二十世紀——公元五〇五年）

我國早期北方草原金銀器主要是金片金絲工藝製品，分布於青海卡若文化、甘肅四壩文化、陝西淳化、山西離石以及北京平谷等地，大

致在今西北、華北偏南的地帶。金製品有桃形金片飾、金耳飾、包金貝、金耳環、金鼻飲、金耳墜、金弧形飾、金弓形飾、金筭、金臂釧等等，均為隨身繫佩的耳、鼻、胸、腕等裝飾，除了金貝為模仿海貝之外，其他裝飾品均為幾何形的，甚至就是用綫條作旋轉狀的蟠屈形器。毫無疑義，這些草原邊疆部落均為我國羌戎、狄夷等原住民以及鬼方、獫狁等方國。打製的金器確為最原始者，但它却是地道的金工藝，這說明我國邊疆部落對金的延展性之優異、耐蝕性之經久早已有所認識，並創造了錘打金葉金片、拉絲、盤絲的特殊工藝。他們製造了一些標誌身份尊貴、引人注目的頭與手上的熠熠生輝的金飾器，它是歐亞金工藝板塊上極東處獨立成長的土著金文化。由於時空跨度很大，難以論證它與西方金工藝發生過什麼聯繫，這須扼要地瞭解一下西方金器的歷史。如果我們極目西方，則不難發現在我國遠方確實存在着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古亞述、古波斯等強大王國金銀器構成的長達萬里的西方金銀器文化帶，還有與之并存而又稍晚的一條金銀器帶則是斯基泰騎馬民族草原地區的金銀器文化帶。這兩條金銀器文化帶雖其文化傳統不同，但其相互滲透與融會極其明顯的，共同組成了繁華交錯的西方金銀器文化帶，早在我國青銅器時代之前，它已邁進以金細工工藝為主流的高度發達的金工藝階段，製造了不少堪稱絕品的金銀器，其中一部分已流散，為歐美各大國的著名博物館收購珍藏。如果略早於卡約文化及夏商文化的兩河流域和西亞古王國的金銀器確實流入我國西北、華北，總會留下痕迹，可是迄今仍屬渺茫，不見其踪影。中西金銀器文化的碰撞地和鏗入點仍是今後中外考古學家的歷史任務。

鬼方是我國夏商時代北方與西北的一支強大的邊疆部落，殷武丁時曾與鬼方發生戰爭達三年之久，確是殷王朝之勁敵。鬼方分布於今山西、河北，盛時其勢已達隴山和渭水流域，周之後不見記載。繼之而起的是獫狁，也是活動於中國北方與西北的古代部落。我國金片、金絲工藝製品出土情況正與鬼方、獫狁活動區域及時間基本吻合，想必這并非偶然的巧合。至西周中期，獫狁漸強，經常威脅周王朝，終於迫使周平王於公元前七七〇年東遷至洛陽，從此我國歷史便進入春秋時代（公元前七七〇年—公元前四七六年），戰國時代（公元前四七五年—公元前二二一年）。

戰國時期中國北方出現了强悍的匈奴與東胡，經常出沒於秦、趙、燕三國之北部邊境，強盛時控弦之士達到三十餘萬之眾，其所據土地廣袤，東至遼河，西至葱嶺，北抵貝加爾湖，南達長城，建立了強大統一的游牧軍事政權。匈奴金銀器出土於今內蒙古、陝西、甘肅、寧夏、新疆以及河北等地，其中內蒙古杭錦旗阿魯柴登、鄂爾多斯市準噶爾旗西溝畔、東巴爾虎完工和陝西神木納林高兔等墓葬出土了一批匈奴的重要金銀器，說明這些墓葬所在地可能是不同等級匈奴貴族駐紮的地方，對研究匈奴族的擴張活動也有着重大的史料價值。

阿魯柴登所出土重達四千餘克的二一八件金器當為匈奴單于的珍貴遺物，計有金冠（鷹飾金冠頂、金箍）、金豹噬野猪紋嵌寶石帶扣、金虎咬牛飾片、金卧虎形飾片、金羊形飾片、金刺猊形綴飾、金羚羊形飾片、金三鷲形圓扣飾、金珠項飾、金鎖鏈、金項圈、金鑲松石耳墜和虎頭形飾件以及銀狼鹿紋牌等金銀器。其工藝嫺熟，可分為鑄造、金片錘鑿、鑲嵌寶石以及金炸珠焊飾等多種金工藝。最有代表性的金冠（彩圖二五）現僅有冠頂、冠箍二殘件，可知其金冠當年之華貴和莊重。冠頂由鑲綴松石的展翅雄鷲和相對的狼羊組成，用金片打鑿、焊接、鑲嵌等金工藝製造，冠箍則用熔鑄工藝一氣呵成。冠箍前部由兩帶上下并連，末端用榫鉚銜接，兩端各飾隱起的卧虎及馬、羊等獸紋，體現了單于統帥千軍萬馬的至高權威。金鑲松石耳墜（彩圖二一）所用金絲、金片及連綴松石本屬較為普通的一般金工藝，然

而在其連綴松石的金件上焊有金炸珠，以三珠鋪底上焊一珠的二層焊接，似為迄今所見我國出土的製造年代最早的金炸珠焊接工藝的實證。本冊選登二十三件阿魯柴登及準噶爾西溝畔、東勝等地匈奴墓葬出土的金銀器，祇不過是戰國時期鄂爾多斯匈奴金工藝的一個縮影，其實際水平遠比此更為高超。

通觀上述各地出土的匈奴金銀器，均散發着中西亞草原騎馬民族的藝術芳香，在其表現題材和形式、手法上與中西亞草原騎馬民族金銀器有着不少的相通之處，甚至斯基泰·塞人的外來文化——格里芬（Griffin）守護神也傳入匈奴，已見匈奴格里芬神獸不下三例，如杭錦旗阿魯柴登出土金大角卧狼飾牌和鄂爾多斯準噶爾西溝畔出土金怪獸紋飾牌（彩圖一九）、金站立怪獸紋飾片（彩圖二〇）均為來自中亞塞種格里芬守護神而又加以變化，如其凶猛氣勢有所減弱，雙翼退化以至消失，強調雙角的分叉并加長或其前施加鷹首，還采用大角狼形作守護神，這在斯基泰·塞人金守護神中是前所未見的。

由此可知，戰國匈奴金銀器可能與西鄰的斯基泰·塞人的金銀器有着一定聯繫，這是正常的現象，但是匈奴金銀器也確有它的獨特個性。準噶爾旗西溝畔還出土了一批戰國、西漢時期匈奴金器，其金卧羊帶扣（彩圖五四）不僅是迄今所見較早的一件金帶扣，而且在形象的藝術處理上也進入了一個新境界，如其羊紋頭角突起，身肢隱起，兩種形體之焊接處理手法十分巧妙，做到天衣無縫、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在匈奴金器中頗富新意，與秦漢現實主義藝術手法亦不無關係。金虎豕咬鬥紋飾牌（彩圖五五）一對均作長方形，以金片錘鑿虎豕互咬其臀，正處於勝負未決的生死一搏的瞬間，從其運動狀態及虎身作一百八十度的反現實的扭轉動作來看，確是匈奴族的藝術創作特點，可見匈奴金工藝部分來自斯基泰·塞人，但其形象及其細部處理上又似出自西漢做工，故疑其為漢族工匠按照匈奴的審美要求以西漢現實主義藝術手法錘鑿而成的，其產地究竟是匈奴領地還是西漢朝廷作坊尚有待酌考。金、玉瑪瑙頭飾、項飾（彩圖五六）已被厘定為匈奴貴婦之裝飾，其中的一副鑲鏤空螭虎紋飾玉片耳墜曾發表於《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編·九·圖版一八三》，已指出此玉飾為西漢玉工所琢碾，而其鹿紋掐絲金飾件則是典型的匈奴工藝，這是西漢玉文化與匈奴金文化相融會的產物，反映了西漢與匈奴在殘酷的戰爭之外還有着文化上、工藝上相互交流的友好聯繫。以上述金器之細微處可窺知已被忽略了的歷史佳話。

東漢時匈奴在西北、北方的勢力衰退，其時各族紛爭、戰事頻仍、進退無常、遷移不止，所出彼時金銀器在數量上、質量上遠不及戰國、秦、西漢。新疆博爾塔拉蒙古族自治州精河縣城古墓葬出土了金器，論者謂可能是塞種人或烏孫人之遺物。吐魯番交河古城址墓葬出土了一批金器，計有金冠、金牌飾、金戒指、耳飾以及多種金飾件。金冠（彩圖六五）今僅存金箍，是否有頂飾不明，與戰國阿魯柴登匈奴單于金冠之金箍在造型上確有繼承關係，但用金量和工藝上已有很大差別，如前者鑄造，純金量重一二〇二克，後者用金片焊接，用金僅七九點七克，其比為一五點四比一，說明兩物主地位高下、財富豐歉不屬同一等級。工藝上前者精緻，後者則不够精緻。值得一提的還有金怪鳥啄虎紋飾（彩圖六七），用金片錘鑿而成，此怪鳥甚怪，不見第二例，其狀頭似豎耳獸，但長勾喙，身彎曲似「C」字，有三排鱗紋，二足，上足在腹部，前後僅二爪，抓啄虎頸虎頭，下足在尾尖，亦二爪，支撐身軀立穩。從尾至背共出三縷向上勾捲的毛髮，似翼非翼，似鱗非鱗。老虎完全被懾服，任其擺布。此飾外無方框，頗似斯基泰金器，但其形象內涵應如何破譯？還要翹首等待！金鑲綠松石耳飾（彩圖六一）用粗

金絲掐成，內鑲綠松石和白石為飾，別具一格。同出的金牛頭形牌飾（彩圖六二）形象與此類同，想必不是偶然的，必有信仰、習俗、族屬或審美上的內在聯繫。遺憾的是當今限於資料不足，還不易做出明確的判斷。出於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金辟邪紋帶扣（彩圖六〇），顯然是漢朝廷作坊所製，頒賜給高級將領或匈奴權貴，精美絕倫、舉世無雙。青海海北州祁連縣出土的金狼噬牛牌飾（彩圖七〇）係熔鑄而成，長一四點七厘米、寬九點二厘米、重三六五克，是所見尚存於國內的匈奴金牌飾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其嵌件現已脫失殆盡。該飾外形像一橫置的「B」字，在一棵大樹上站立的牛被偷襲的餓狼咬住一條後腿正欲掙脫。這種生活題材的金牌飾也是極為少見，此金牌飾的外形、構圖及表現手法與斯基泰·西伯利金牌飾十分接近，故其族屬及製造年代均與斯基泰或薩爾馬泰（Sarmatian）金牌飾相去不遠，其下限應不晚於漢代。鮮卑興起於今內蒙古自治區東部和遼寧西部，其早期金器甚少，從金鳳鳥形步搖冠飾（彩圖五九）則可見鮮卑金器之一斑。此金步搖係用金片製成鳳鳥之首、頸、身、翅、尾、圓座和圓片，再焊接成型，可能是步搖冠之頂飾。

東漢亡後（公元二二〇年），經歷了三國（公元二二〇—二六五年）、西晉（公元二六五—三一六年），東晉十六國（公元三一七—四二〇年）、南北朝（公元四二〇—五八九年），長達三六九年。邊疆民族南下，攻占北方與中原，漢族政權退至黃淮以南，形成了南（漢族）北（鮮卑族等）對峙的分治局面。此時北方馬背民族中柔然、蠕蠕、東胡、山戎各據一方互相抗爭。從大興安嶺南下的鮮卑族占據東北、北方、西北方的大部分土地和財富，並鑄造了大批金銀器。

西晉頒賜鮮卑王、烏桓王金銀印出土於內蒙古涼城縣小壩子灘。金「晉鮮卑歸義侯」印（彩圖七三）、金「晉烏丸歸義侯」印（彩圖七四）以及銀「晉鮮卑率善中郎將」印（彩圖七五）等晉官印的出土說明該地為鮮卑某部的轄區及其與晉王朝的隸屬關係。金「猗它金」銘四獸紋飾牌（彩圖七六）有所來歷。據考，「猗它」即「猗它」，係西晉末年鮮卑始祖力微子猗它的遺物。四獸作雙層頭向外的布局，均為馬身爪趾怪獸，上二獸鳥喙正在啄一物。下層二獸吻似駝，張口，口下有一個三角樺形物，通身設鑲嵌用坑，其鑲嵌物已佚。其重要價值在於它確為猗它時所製之鮮卑拓跋金器的物證，可能是鮮卑拓跋的守護神，但其鑄造、修整、鑲嵌等工藝水平尚屬一般，顯示該地猗它部的金工藝正處於起步成長階段。同出的金鑲寶石跪獸帽飾、金熊頭飾、金戒指可能也都是猗它部貴族生前所用之金飾。金四鳥紋飾件（彩圖七九）上二鳥外突，下二鳥首內向。上二鳥首之中有雙手扶鳥背的人物，其下原有嵌物已佚，其兩側有圓形隱起紋。下二鳥首之間垂一棱形物，飾雙立角二豎耳，整體造型似商周之饗饗形，疑其仍係拓跋鮮卑之靈物。金三鹿紋牌（彩圖八〇）外框長方形，以極度省略變形的抽象手法表現在層山疊嶂之上的三隻肥壯大鹿，其身後為長拱形的森林，這種構圖及其手法在拓跋鮮卑金飾中極為少見。烏盟和林格爾出土一北朝嵌寶石金帶飾是一套完整的金帶扣，上飾奔馳的野豬，身嵌綠松石和黑玉髓，具有濃厚的草原金器風格，應為鮮卑革帶之扣飾，也就是所謂「鮮卑頭」遺物。類此金扣飾的還出土於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討不氣村的北朝金辟邪紋帶飾（彩圖八一），此金帶扣飾共六件，較前件更為完善，從其辟邪紋來看是東漢至北朝的鮮卑革帶上的金扣飾，應為西晉頒賜或被鮮卑劫掠至此，然後再經加工，故其形為鮮卑式，紋飾為漢樣，是漢與鮮卑融合的結晶。兩枚金嵌松石羊形戒指（彩圖八四、八五），當為北魏鮮卑金細工產品，一出土於呼和浩特市郊區，另一出土於包頭市土默特右旗美岱村，反映了此類金戒指的地緣關係。

鮮卑金龍項飾（彩圖八六）之二龍各吐鈎與環，鈎環扣合為項鏈，身用細金絲編成多股辮紋，左右兩側各飾金盾、金戟、金鉞、金櫛，惟金鉞僅一件，今呈附飾七件墜飾，其飾金鉞可證此鏈確為鮮卑貴族或王之項飾。金鹿頭冠飾、金三角鹿頭冠飾、金牛頭冠飾（彩圖八七）當為鮮卑貴婦之步搖冠飾，工藝亦較精，也是難得的鮮卑金器。內蒙古通遼市科爾沁左翼中旗出土了用範鑄的金人面形飾牌（彩圖九一）可能是薩滿形象縫綴於袍上的作法，以勾通人神。同出的金蹲踞馬飾件（彩圖八九）、金子母馬飾件（彩圖九〇），這類金飾在內蒙古西部很少見，可能是東部鮮卑的遺物。同出的金神獸飾件（彩圖九二）却，以溝通人神。與西晉鮮卑『猗屯金』銘的金獸紋飾牌下層二爪趾馬身獸近似，疑其屬『猗屯』部之物流傳至東部。

慕容鮮卑先後建立了前、後、南、北四個燕國。轄河北、山東、山西、河南及遼寧之一部，即史稱『五胡十六國』之割據一方的短祚地方政權。公元三三七年，慕容建前燕，傳四代，亡於前秦。遼寧北票縣四花營子鄉房身村二號墓出土了一批前燕金器，包括金花樹狀步搖冠飾（彩圖九四）、金新月形嵌青金石片鳳紋飾（彩圖九五）、金嵌寶石戒指（彩圖九六）、金頂針（彩圖九七）等。

馮素弗為北燕天王馮跋（？—四三〇年）之長弟，任大司馬錄尚書事、車騎大將軍，封遼西公，在後燕高雲（公元四〇七—四〇八年）時被封為范陽公。金『范陽公章』印（彩圖九九）及『車騎大將軍章』、『大司馬章』、『遼西公章』均同出於馮素弗墓。金佛像紋璫（彩圖一〇〇）、金附蟬紋璫（彩圖一〇一）、金步搖冠頂（彩圖一〇二）、金刀柄（彩圖一〇三）均為北燕統治階層占有的具有代表性的金器，可見慕容鮮卑與漢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大同是拓跋鮮卑南下後所建首都，也出土了一批金銀器，小站村封和突墓出土了外國銀鍍金盤以及銀耳杯和銀高足杯等銀器。銀耳杯杯口呈兩端高中間低的馬鞍狀，底有橢圓形圈足，足部邊緣焊聯珠一周，這是一種具有草原金銀器特點的新型銀耳杯。

一九九七年十月，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昭蘇西南九十公里的波馬出土了金面具、金鑲嵌紅瑪瑙虎柄杯、嵌紅寶石金戒指、嵌紅寶石金蓋罐等一批珍貴的金銀器。其特點是：

（一）出現了罕見的金面具。其金鑲紅寶石面具（彩圖一〇八），睜眼、高鼻、口微啓、眉鬚均用紅寶石（石榴石）鑲嵌，是一副美化的英雄面貌。

（二）寶石瑪瑙鑲嵌盛行。金鑲紅瑪瑙虎柄杯（彩圖一〇九）口作馬鞍形、鼓腹、圈足、通身鑿四方連續之菱格紋，內嵌紅瑪瑙。金鑲嵌紅寶石劍鞘（彩圖一一一），也是通身嵌三行紅寶石。

（三）金器皿較多。金鑲紅寶石寶相花蓋罐（彩圖一一〇）造型豐滿華貴。銀錯金瓶（彩圖一一六）侈口、橄欖形身、平底、頸下錯金帶、鑿花紋一周。還有上述金鑲紅瑪瑙虎柄杯，共三件，均為杯、瓶、罐，亦屬罕見，不見漢唐盛行的盤碗。

（四）形飾具有地中海文明特色。

（五）不見斯基泰草原騎馬民族兩獸咬鬥、嵌松石、牌飾等在內容形式上富有民族特色的金銀器，故應看作是希臘化地區如大夏國金銀工匠按照西突厥可汗或貴族要求所製，也有可能其中某些金銀器就是直接來自大夏國等地。

上述金銀器的年代從其出土地可知，此地是突厥西部領地。據考，公元五四五年西魏遣使通突厥；公元五五一年突厥土門可汗破鐵勒，妻西魏公主；公元五五二年土門可汗大破柔然；公元五五五年突厥再破柔然，又西敗嚙噠，東逐契丹，遂為北方大國。在土門可汗攻滅柔然之時，土門弟室點密率眾征戰西域，盡據烏孫古地，自稱可汗，牙帳設於伊犁特克河流域，史稱第一汗國（公元五五二—六三〇年）西突厥。室點密歿於公元五七〇年（北周建德五年，北齊隆化元年），由達頭（步迦）可汗（公元五七六—六〇三年）繼位。目前因西突厥金銀器出土情況不明，可供用於比較的資料難覓，今參酌開皇二十年（公元六〇〇年）四月遣將分道擊西突厥大破之、大業元年（公元六〇五年）西突厥大亂等史料，姑且將波馬金銀器的下限定於公元六〇五年，其上限斷於公元五七〇年，故將波馬金銀器暫附於北方草原地帶金銀器之尾，充其為殿軍尚屬適宜。

二、中原金銀器

商——南北朝（公元前十六世紀——公元五八九年）

中原金銀器是指生產於商周——南北朝中央政權所轄區域的具有中原國家王室風格的金銀器而言。其已頒賜草原民族首領者已在上述草原部分做了介紹，於此不贅。另外，也不含古蜀國、滇國等地方政權的金銀器。

商代金器施用金片工藝製造，即將天然金塊錘打成薄片，再經剪切成一定的形狀用於包貼在銅、木、漆等器物的整體或局部，以改變其質色，並增添其莊重性、嚴肅性、尊貴性或神秘性。此種狀態的金工藝尚不能製造獨立的金器，而僅僅製成某種器物的飾件，包貼其表面，則祇能稱其為某種器物的輔助性工藝，還不是獨立的金工藝。工匠把自然生成的金砂、金麩、金塊打製成金片並剪裁成各種幾何形狀和虎、人面等肖生形狀，成為各種形式的小件產品，這標志着黃金加工工藝已邁出第一步並登上工藝舞臺，有了自己的名分和地位。也可以說商代確是中原金工藝的萌發期。金塊被錘打延展至薄如絹帛時被稱為金片，如繼續加工使其薄如樹葉時則稱金葉，薄如蟬翼時叫做金箔。出土於安陽大司空村的商代金片經檢測，其厚度僅〇點〇一正負〇點〇〇一毫米，也就是說金箔最薄的可達到〇點一微米，這也是拍打黃金塊體呈片狀的工藝中極其重大的成就。此時，北部邊疆地區已盛行金絲工藝，但這種工藝製品尚不見於商王朝。

西周黃金工藝吸收青銅器工藝經驗，開始使用熔鑄工藝技術以製新型金工藝品。周王室金器迄今尚未寓目，僅可見虢、晉兩地方侯國金器，均為革帶上的金飾。虢國貴族所用金帶飾共十二件，計有金環六件，長方抹角環一件（正面均飾有陽綫二道）、獸面三件、鏤空獸面紋銳三角形飾二件，共重四三三點二五克。晉侯金帶飾（彩圖一一七）一副十五件，另一副是六件，形制與虢國貴族金帶飾大同小異，一副重量四五九點三克。由此可知周王室對金帶飾可能已有規定，對其件數、形式和重量都不得越規。當然，各諸侯在具體執行時一方面循章辦理，尚不敢違規僭越，另一方面也有一定的靈活性而略有變化。虢、晉兩國貴族所用金器品種單一，工藝借用青銅鑄造技術，熔鑄金器，尚不屬獨

立性的金工藝。

春秋戰國金銀器使用的地區、品種都有所增加，出現了金圓泡、金帶鈎、金帶扣、金帶飾、金環和金劍柄等器型，用於裝飾和車馬兵器等方面，但其工藝仍沿襲商、西周的熔鑄法，偶爾也採用鑲嵌工藝，豐富了金工藝的表現手法和感染力量。從工藝角度來衡量，春秋金工藝略有進步，這表現在三點上：一是鑄造工藝複雜化，可能借用當時青銅工藝的失蠟法做成鏤空型金器；二是圖案較為繁密，更接近青銅器紋飾；三是應用鑲嵌綠松石的工藝，出現了鑲嵌綠松石金器。其金工藝進展速度雖然較西周稍快，但仍未脫離青銅工藝的影響，僅僅利用黃金易熔、易延的特性，借用多種青銅工藝以發揚其不銹蝕、永不變色、閃爍光耀的優勢，為獨立的金工藝的形成打下了技術上的準備工作，可知中原金工藝的出現與形成該有多麼艱難。

春秋時期熔鑄金器的代表作有金柄鐵劍。本冊刊登的共有三把金劍柄，其中極為出色的是金柄鐵劍（彩圖一一八），此器之首與柄、格一次鑄成，其蟠夔紋有龍首與鳳首二種，身飾圓形鱗紋。劍首鏤空，柄有五脊，格與鐵劍銜接牢固，不設鏤空。兩側與劍首配合，均出兩歧，錯落有致，變化多端。嵌坑較深，鑲入的碧藍色變形夔紋和圓形材料少有脫落，可謂設計巧妙，鑄造精緻，金碧輝煌，堪稱迄今所見春秋秦國金器之最，尤其鐵劍亦完好如新，是不易多得的完器。

金狗（彩圖一二三）出於鳳翔秦公一號大墓，從其豎起大耳、趾爪捲成圓形、長尾捲尖的簡潔抽象的造型和程式化的動態來看，大有草原金器的藝術風采，疑其或為獵狃金工之子遺，也是威鎮西北的秦國與鄰近的邊疆少數民族在金工藝上曾有交流的歷史見證。

戰國金工藝在春秋鑄造金工藝的基礎上有了一定的提高，並出現了新品種。各諸侯國的金銀器出現了一定的地方性特點。就金工藝總體進展情況來看，各諸侯國金工藝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所見秦國金器，從其金虎、金鋪首和金龍紋飾（彩圖一二八）來看，與秦春秋時期的金工藝基本一致。此期金銀帶鈎較春秋時期帶鈎不論在形飾上還是在工藝上都出現了不少的變化，如東周都邑洛陽出土的金雙龍首鈎、銀四體相連的銀雙龍首包金帶鈎（彩圖一三一）是前所未見的新式金銀帶鈎。中山國金錯鳳紋銀帶鈎（彩圖一四八），魯國龍首、獸首及猿形帶鈎，江蘇漣水三里墩西漢墓出土兩件戰國金銀帶鈎確是罕見的金銀帶鈎。尤其是漣水西漢墓所出的重二五七克的怪獸口銜龍首琵琶形戰國金銀帶鈎（彩圖一四六），其形象所概念的文化內涵值得今後深入探討，僅從其做工之精美來衡量，稱其為戰國金銀帶鈎中的神品亦不為之過。與此相比，戰國早期曾侯乙墓所出四件金帶鈎（彩圖一五五）則顯得樸素無華。如此多種風格并存的金銀帶鈎，反映了各路諸侯的黃金觀及其審美觀的差別，也必然影響到金銀工藝的發展和提高。齊國金銀器近年已初露端倪，所見有金耳墜、銀盤、銀耳杯、銀勺、銀匕及銀管等器物多為生活飲食用器，其中最為精美的則是龍紋銀盤、銀耳杯（彩圖一三二），二件均刻銘文。據考，銀耳杯銘為秦昭王四十年（公元前二六七年）、秦昭王四十一年（公元前二六六年）所造，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秦國銀器之佳品。『趙陵夫人』銘銀匣（彩圖一三三）有流，無紋飾，流下外腹部豎刻『趙陵夫人』銘，據考，應為戰國晚期秦國卿大夫以上官職的婦人用器。此桃形匣與傳世的『客室十』銘楚王匣的器型相似，對研究並確認其產地不無參考價值。與此同出的還有一件帶有北方草原風格的金耳墜，此器以金絲、金炸珠、鑲嵌綠松石等金細工藝製成，通長七點三厘米，七、八層連接，小巧玲瓏、精緻無比，可能是匈奴工匠所製，遂而流傳至齊